

陈建功1949年生于广西北海，1957年随父母进京。1968年高中毕业，随即到京西成为一名煤矿工人。经受十年矿工生活的磨砺后，1977年，陈建功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后成为北京作家协会专业作家。1995年就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兼创研部主任，2001年，陈建功为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2003年起，他连续担任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2013年起，出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

几百字的履历下面，积淀着陈建功厚实的人生追忆。

上世纪40年代末，陈建功的父亲从广西北海负笈广州求学，新中国成立后，被选送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1957年留校任教。当时陈建功的母亲同时也在地处桂林的广西师范学院（现名广西师范大学）进修。1957年，母亲毕业与父亲团聚，不久就把自幼跟奶奶在北海生活的陈建功接到北京，自此一家团圆。陈建功先后入读中国人民大学附小、附中，1968年高中毕业。其时，文革已经爆发两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他和同代人一样失去了进大学学习的机会。

### 艰苦而压抑的煤矿生活

1968年，“文革”早期的狂热已趋于平静，国家也开始考虑拥塞在城市的青年的就业问题。“上山下乡”运动还没开始，北京市矿务局来到海淀区各中学招录煤矿工人。19岁的陈建功和其他300人一并被招入位于北京西部头沟区的木城涧煤矿，成为井下生产第一线的采掘工人。陈建功记得，那时的他身高1米73，身架瘦小，体重不到100斤，但每天都得扛着沉重的风锤（凿岩机）下到黑暗浊闷的井下去干满8个小时的重体力活，加上下井、出井的时间和出井后的洗澡时间，实际上每天的工作时间达9个小时。“还是很艰苦的”，他描述说，每当掌子面爆破之后，硝烟未散，他就要和工友们一起，扛着风锤过去，接着下一轮的打眼放炮。巷道里的烟尘未落，硝烟滚滚地往外涌，他得猫着腰，有时甚至得趴到排水沟边上去喘气。陈建功干活儿是卖力的，他扛得住这种体力上的磨练。然而，让他痛苦的是，那个时代政治上不公正待遇带给他的压抑。

当时班组里有一个师傅曾是志愿军战士，上甘岭战役中，他的战友们都英勇牺牲，唯有他因被炮弹震晕而致被俘。在战俘营里，他没有选择去台湾，而是回到祖国大陆。按照“左”的政策，他没有得到善待，“文革”中更是被指为“叛徒”。倍觉冤屈的师傅与陈建功倾诉，陈建功建议他到地处西安门的“国务院信访中心”申诉。结果被当时的党支部书记扣上“为叛徒翻案”的罪名。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展，插队的青年中，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也渐渐深刻起来。山西有些知识青年办了本油印小册子，其中对“文革”和中国乡村现状提出了不少质疑。寄给陈建功看，陈建功看了觉得很有意思，就搁在褥子下面。谁知被发现，结果那位党支部书记又怀疑陈建功与山西的“反革命集团”有联系。再如，有一次下夜班，陈建功无意中念出了曹禺话剧《日出》中的台词，“太阳出来了，黑夜即将过去，太阳不属于我们，我们要睡了”，结果被认为他是在“攻击红太阳”，那位领导组织工友们大字报揭批他，还让他参加“严冬大会”，把他身边那些“有问题的人”一一揪出，批斗、逮捕，看得他心惊胆颤。

陈建功感慨当年“工作上艰苦，政治上也不得意”。但矿上知道他是个会写文章的人，“九大”召开后，支部书记找到陈建功让他写九大辅导报告。“一方面挨整，一方面得阐释当时的政策”，对此，几年后的陈建功不无自嘲地说，从那时起，他就承担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双重使命，一方面“挨整”，一方面还得“讴歌”。

1973年8月的一天，陈建功在井下遭遇事故——他在指挥调车时被出轨的矿车甩到轨道上，被另一辆矿车卷到碰头下面。危急时刻一旁的同事把继续前冲的矿车扛住，他这才得以活命。陈建功腰1和胸12脊柱压缩骨折，左腿肌肉萎缩，几无知觉。在矿务局住院住了几个月才得以出院。这个过程中，工人师傅们对他



1959年，陈建功和家人在一起（右二）。

陈建功成名很早，1980年发表的《丹凤眼》就于当年获得第二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紧接着于1981年发表的《飘逝的花头巾》也获得了当年度的第三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由此以突出的创作实力成为了文学界的新锐。之后他又持续耕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一时享誉文坛。1995年他46岁时被调入中国作协担任领导工作，在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乃至副主席的岗位上一干就是十几年，为当代文学的发展和文学组织工作做出了贡献。

# 陈建功： 从京西煤矿走出来的大作家

□朱家雄/文



7岁时的陈建功和奶奶、母亲以及姐姐在北京。

的救助和照顾是陈建功一直不能忘怀的，他从中深深体会到普通矿工充盈的质朴、真情与善良。多年后回首当年，他也感悟到艰苦的矿工岁月其实也砥砺了他们这一代知青精神质地和人格品性。

### 考上北大在北大浸润四年

也是在1973年，国家来矿里招收工农兵大学生。陈建功干活很卖力，又爱读书，工人们都推荐他去，但当时的矿领导却不同意，还是认为他有“政治问题”。1977年，高考体制全面恢复。在“妈妈的唠叨”下，临时突击了三个月功课。“在一个寒冷凄清的清晨，和十几个同伴坐着大卡车来到门头沟区色树坟中学参加考试”，“那时的色树坟中学尚属简陋凋敝，比起我十年前毕业的大人附中有些寒酸，这里却成了我的命运转折之地”。陈建功由此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他各门功课都是90多分，唯独语文只打了80多分。多年后他才从后来成为他老师的谢冕先生那里知道，前去招生的谢冕颇为这位考生的作文成绩感到困惑——既然是要报考文学专业，为什么作文得分却“不过尔尔”。直到查看了考卷谢老师才恍然大悟，这考生的作文是按发表的文章路子写的，所以判卷老师给分不高。当然，他的总积分考到了录取线以上，因此录取他并不成为问题。但这段故事还是成为了谢老师和陈建功之间师生情谊的趣闻。

1978年2月，陈建功和众多天之骄子步入未名湖畔的这所名校，由煤矿工人蜕变为文学专业的一名大学生。四年间，他在中文系的众多名师门下求学，广采博收，文学功底日益扎实。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们格外幸运，他们可以听著名诗人林庚讲授《楚辞》



在读者见面会上，和读者交流心得。



四名矿工出身的作家（右起刘庆邦、陈建功、谭谈、梁瑞郴）在曾国藩故居富厚堂前合影。



2012年，陈建功到平谷五中作报告，并对学生进行写作指导。

命，但他又是在这一年始文学起步的。这一年，他从矿务局医院出院后，因工伤在身，就不用再下井了，单位安排他在地面和几个老太太筛沙子，而且这活干得断断续续，他时常会被派去完成一些工作任务。比如他曾奉命去北京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即北京出版社）报到，去参与、完成一套反映工人的报告文学作品，为此他被安排在花市东兴隆街51号，据说是北洋时代的海军部旧址的小楼里改稿，一住好几个月。正值“文革后期恢复文艺的阶段”，他认识了在这里写《金光大道》的浩然、在这里写《向秀丽》的工人诗人李学鳌，还有后来也都成为了著名作家的理由、陈祖芬、刘心武、母国政等。陈建功拿了自己写的诗送到李学鳌那儿请教，李学鳌觉得写得很好，就给拿到《北京文艺》发表了。

陈建功拿了自己的小说给浩然看，浩然对年轻作者热情且指导具体，他告诉陈建功：“小说人物性格是要理清楚的，小说就是揭示这性格的形成与发展。各种小说有自己的结构要求。就拿树来比方，长篇小说就是参天大树，中篇小说就是一棵枝蔓不大开的小树，短篇小说就是树干的一个横切面”，云云。陈建功说，这些说法或不够严谨，对于初入文学之门的他来说，确是深入浅出受益良多的。说起浩然，陈建功说，粉碎“四人帮”后，对浩然等“文革红人”予以审查当然是必要的，但也应实事求是。那时，陈建功曾有一两个月没见到浩然，再见到他时，说是去山西了，江青当时在山西的“大寨”住着，让浩然去那参加一个文艺活动，还表示想让浩然当文化部长。但浩然当场表示敬谢不敏，说自己当作家就好。回到北京，浩然和陈建功讲起这事，表示对江青所搞的“那一套”不以为然。1974年西沙海战打完后，江青又点名派浩然、张永新去慰问海军，回来后，两人也都写出了“奉旨之作”。陈建功说，作为一个作家，是应该反省的，但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浩然所为，是勉为其难，不得已为之，是应该实事求是的评价。

1973年，陈建功在《人民日报》发表短篇小说《铁扁担上任》，1974年发表小说《青山师傅》《红卫兵的步伐》，1976年发表讴歌红卫兵的小说《火红的袖标》，1978年发表《流水弯弯》，等等。1979年，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制片人邀请陈建功到北大读书的陈建

功去上海改一部献礼片的剧本。正在上海的时候，一天，陈建功在路上买了份《文汇报》，看到上面刊登了一篇后来被誉为“伤痕文学”开山之作——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陈建功读了很受触动，回去就表示自己“不能再编下去了，要回北大了！”——我们现在所写，无非就是把‘四人帮’时代倡导的和走资派斗争的题材改成我们和‘四人帮’斗争的题材。”陈建功由此意识到自己的写作要转型了。

1979年，陈建功在多家重要文学刊物发表了短篇小说《被揉碎的晨曦》《甜蜜》以及伤痕小说《走向高高的祭坛》、京味小说《京西有个骚达子》。1980年，其短篇小说《盖棺》发表于《北京文学》，随后被《小说选刊》试刊第一期作为头条转载。陈建功觉得《甜蜜》还难免有“文革文艺”思维之围，《京西有个骚达子》则直面真实的底层人物，并尝试用悲喜剧的方式来处理小说。陈建功自此较自觉地“从京味小说转向了京味的悲喜剧，很注意风格，笔触指向北京底层的煤矿生活”。

陈建功在当代文学史上的标签是“京味作家”，而他最为人称道的两个短篇小说代表作也都发表于《北京文学》杂志。其一是1980年发表的《丹凤眼》，其二是1981年发表的《飘逝的花头巾》，前者获得了1980年的第二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后者获得了1981年的第三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连续两年斩获最权威的国家级奖项，在那个全国人民都热衷于看小说，文学刊物动辄发行量几十万册的年代，陈建功名声鹊起。

### 从专业作家到作协领导、政协委员

1982年初，自北大毕业的陈建功被分配进北京作协成为一名为人艳羡的专业作家，并在这里一直呆到1995年。当时的北京作协可谓名家云集，如肖军、端木蕻良、骆宾基、杨沫、王蒙、邓友梅、从维熙、刘绍棠、刘心武、张洁、理由、李陀等等，陈建功作为当中最年轻的专业作家，既受到呵护，也学到了很多。这十余年间，陈建功创作颇丰，他陆续创作发表了一批高质量的作品，这一切沉甸甸的创作成果，更加夯实了他作为新时期文学重要作家的地位。

1995年4月，陈建功和高洪波、吉狄马加三位相对年轻的作家、诗人一起被组织上选中调入中国作协担任书记处书记，陈建功兼任创作研究部主任，1995年到1997年，陈建功还兼任了两年作家出版社社长。在这期间，陈建功推进了《小说选刊》的复刊工作，见证了作家出版社的改革，并分管了一段时间作协旗下的报刊杂志。2001年起，陈建功担任了中国作协专职副主席，同时担任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随后还曾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作家王蒙当年曾对陈建功说：“不管你本人持什么观点，你要考虑到文学的多样性、包容性，要注意作协为作家服务的多样性。”陈建功觉得在理，多年来在领导岗位上也是秉持这样的原则工作的。在第六届、第七届作协副主席的领导岗位上，陈建功以朴素亲切、熟悉创作、尊重作家和热情服务广获好评。

陈建功还是第十届（2003年—2008年）、第十一届（2008年—2013年）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二届（2013年—）全国政协常委，担负着参政议政的神圣职责。针对新的历史时期自由撰稿人活跃的现实，他连续两届提交过关于提高写作人稿费纳税起点的提案；针对网络文艺日渐活跃的现实，他提交过关于作协应关注网络文学发展、加强网络文学研究的提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担任第十届政协委员期间，陈建功向中央建言，拨款设立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获得重视，得到政府的财政支持。现在，它已经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一个固定的文学扶植项目。这一项目的草创阶段，从作品申报、价值评定到成果评估及宣传推广，陈建功在作协党组书记处领导下，无不亲历亲为，把事情做得周到严谨，为现在仍然运行的重点作品扶植机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随着担任领导岗位分管工作的增多，兼任社会职务和从事相应工作的增多，陈建功能够用于写作的时间和精力都捉襟见肘，他不得不在很长的时期内把文学创作暂时放下来，或放在很次要的位置。这对于一位作家来说，这无疑是很大的牺牲。但陈建功认为，他能够用自己的工作，对文学繁荣有所贡献，换来广大写作同行更多更好的创作成果，并无遗憾。对于读者关于他新作的期待，他的回答是：感谢期待，默默努力！